

173433

基本館藏

对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学 关于“社会变遷問題”的批判

(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評述)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
科学出版社出版

(3)
H277
2

13433

94.77
K.2

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 关于“社会变迁问题”的批判

(第三届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评述)

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苏联高教部社会科学教学管理局 編

科 学 出 版 社

1958

出 版 出 版 (北京印刷厂117号)

北京市印刷厂出版 北京印刷厂

西門印刷厂印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58年4月第一版

書号: 1132 印张: 3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京) 0001-5,000

字数: 79,000

定价: (7) 0.34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苏联学者对一九五六年於荷蘭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上的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的主要报告和發言的評述。本書給我們提供了一个關於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学的較為清晰的概念，同时也為我們研究和批判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学作出了良好的开端，可作为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參考資料。

本書原名为“二十世紀的社会变迁問題”，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苏联高等教育部社会科学教学管理局編，苏联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一至三、第五至七部分評述人为唯·米赫耶夫，第四部分为莫·扎伊切娃；校閱人为普·費多謝耶夫、斯·卡切基揚、阿·盧緬切夫。

序 言

国际社会学协会^① 1956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了第三届国际社会学大会。

参加这届大会的有五十七个国家的近五百五十名代表，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学家以外，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科学家也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出席大会的东方各国的社会学家则较少。西欧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都没有出席会议。苏联学者都是以个人身份参加这次大会的工作的，苏联与会的学者有：苏联科学院院士唯·涅姆奇诺夫(В. С. Немчинов)、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普·费多谢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立陶宛联邦共和国科学院副主席弗·捷格拉夫(Ф. Ю. Деглав)、阿·卢缅采夫(А. М. Румянцев)教授、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姆·卡马里(М. Д. Каммари)、莫斯科大学教授斯·卡切基扬(С. Ф. Кечекьян)、基辅大学教授恩·施列帕考夫(Н. С. Шлепаков)、阿·库茨涅佐夫(А. Н. Кузнецов)教授、塔什干大学赫·苏莱曼诺夫(Х. С. Сулайманов)教授和明斯科大学伊·克拉夫琴科(И. С. Кравченко)教授。

此外，伊·凯洛夫(И. А. Каиров)教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科学院)、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阿·帕施考夫(А. И. Пашков)(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阿·施士金(А. Ф. Шишкин)(苏联科学院哲学所)、哥·斯维尔德洛夫(Г. М. Свердлов)(苏联科学院

① 国际社会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缩写为ISA)是由世界许多国家社会学组织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参加该协会的国家有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该协会是在联合国科学、文化和教育组织的总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的。由各国国家社会学组织的代表组成的理事会来领导整个协会的工作，执行委员会、主席、三个副主席和协会秘书长则是由理事会的成员中选出的。

现任主席是乔治·弗利得曼(Georges Friedmann)教授(巴黎)，秘书长是特·鲍托莫尔(T. B. Bottomore)(伦敦)。

第一届国际社会学大会是在1950年在苏黎世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社会学大会是在1953年在列日召开的。

法律研究所)、赫·涅克拉索夫(Н. Н. Некрасов)教授(莫斯科工程經濟研究所)等人都向大会提出了書面报告,並在各种會議上对他們的报告进行了討論。

大会的主题是“二十世紀的社会变迁問題”。

大会分以下七个部分进行了討論:

1. 關於社会变迁問題的一般提法;
2. 經濟結構的变迁;
3. 階級結構的变迁;
4. 家庭变迁;
5. 教育变迁;
6. 社会变迁的其他問題;
7. 社会学教学和社会学家的業務活动。

提交大会的报告都是事先用英文或法文印好的,与会者在参加討論有关問題的會議以前就收到了这些印好的报告。在大会上只是对这些报告进行討論。但是,每个提出报告的人有优先权首先發言为自己的观点辯护,不过他也同其他的發言人一样,每次發言一般不得超出五分鐘。

本書就是研究大会上上述七部分的著作。

目 錄

序言.....	
一、关于社会变迁問題的一般提法.....	1
二、經濟結構的变迁.....	7
三、階級結構的变迁（“社会成層”和“社会流动”）.....	24
四、家庭变迁.....	42
五、教育变迁.....	55
六、社会变迁的其他問題.....	65
七、社会学教学和社会学家的業務活动.....	74
八、几点結論性的意見.....	86

一、關於社会变遷問題的一般提法

对二十世紀所發生的社会变迁的内容和意义的看法，在这次大会上反映出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种是非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像大会上常常講的“西方观点”。

苏联学者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学者提出的馬克思主义观点的本質在於，現代社会变革的根本的和最一般的規律是从許多世紀形成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方式向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制度的过渡。二十世紀主要的社会变迁是許多国家在社会制度上的根本性的革命改造，如：社会主义經濟体系的产生和扩展，新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确立，以及由於以往的落后国家和附屬国各族人民爭取政治上、經濟上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而引起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潰。

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所捍衛的“西方观点”，实际上是企圖用緘默的方式或至少是貶低意义的方式来迴避二十世紀所發生的根本性的社会变化，他們在所謂重大問題实际是枝节問題上兜圈子，並且仅仅局限於闡述資本主义社会範圍內的立法、教育、劳动組織、家庭关系的个别現象和局部改良的意义。資產階級社会学家抱着上述目的，企圖从根本上歪曲社会变迁这一概念。

从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看来，正如唯·涅姆奇諾夫院士和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普·費多謝耶夫在他們的报告中強調指出的，社会变迁乃是社会历史形态的循序渐进的更替，这一更替是由自然历史的合乎規律的过程和人类社会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产生的。但是，在資產階級社会学家看来，例如莫·金斯堡 (Morris Ginsberg) 教授 (倫敦) 在他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則应当把社会变迁看做是“社会結構的任何变化，譬如社会規模的变化、社会成分的变化、社会各个部分

均勢的变化或社会組織形式的变化。这个詞也可用来表明由於团体生活——例如在艺术或語言领域中——而發生的变化。”^①

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在大会上力图漠視社会从低级向高級發展这一事实，因此他們不仅避而不談社会进步，也不談社会發展，甚至连社会“进化”也絕口不談。他們把“社会变迁”这个詞同“进步”、“进化”等概念对立起来。例如，廖·芳·維茨 (Leopold von Wiese) 教授(科倫)在报告中指出，“‘社会变迁’这个詞在我們这个时代几乎完全代替了‘进化’和‘發展’这些以前非常通用的詞，同样，‘社会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代替了‘进步’这个詞……”在他看来，“这种情形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因为用‘变迁’一詞代替‘进化’(或者它的同义語‘發展’)一詞表明对生活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評價更加謹慎了……”^② 廖·芳·維茨認為，以前，譬如十九世紀，人們相信进步虽然是时断时續的，但还是一直向前發展的。在他看来，孔多塞、康德、达尔文、斯宾塞、馬克思等人都抱着这样的見解。但是，他認為，在兩次世界大战影响下，目前对社会前途的看法已經多多少少起了一些变化。例如，施本格勒的哲学^③就表現了这一点。

廖·芳·維茨認為，現在既不要奢談社会进步也不要談社会进化，他說他贊同法国社会学家乔治·顧尔維奇(George Gurvitch)的主張，顧尔維奇曾經說过这样的話：“在社会学中，就这个詞的本义而言，無論是进化的規律，或者是循环式的或波浪式的發展，都不是真实的。”^④ 因此，廖·芳·維茨号召不要在社會中寻求“共同的發展路綫”或“进步的發展方向”，而要研究各种局部“变化”的定义。

在廖·芳·維茨的报告中很明显地表現出企圖从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是不变的这一点出發，在“秩序”的範圍內提出社会变迁，他

① “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彙編”，英文版第 I 卷，第 10 頁。

② 同上，第 2 頁。

③ 施本格勒(1880—1936 年) 德国唯心主义思想家，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先鋒之一。他把历史进步的概念同历史規律性一起拋开了，企圖証明历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也沒有什麼發展的——譯者。

④ 顧尔維奇：“社会决定主义和人类自由”，1954 年巴黎法文版。

說：“我們必須反對把變遷同無秩序等同起來。”^①

其實，廖·芳·維茨所表現的方法論原則正是一切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家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所遵循的主要原則。資產階級社會學家之所以斤斤計較枝節問題，其目的就在於一方面企圖逃避對社會面臨的基本原則問題的研究，另一方面企圖縮小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變遷的深度和廣度。

蘇聯學者同資產階級社會學家不同，他們着重指出，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是我們這個時代歷史進步的康莊大道。如果十九世紀佔統治地位的經濟形式是私人企業的體系，那麼，在二十世紀，社會發展就實現了向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向生活資料集體生產的過渡。

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普·費多謝耶夫在他的報告中說：任何人也不敢否認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正在一往直前地發展着，日益鞏固着，愈來愈多的國家擺脫了舊的資本主義體系，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

在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經濟體系已經崩潰了，現在已有九億以上的人民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之上。引導全體勞動羣眾前進的工人階級已成為現代偉大的社會改造的主要力量。

我們這個時代的社會變革並不僅限於勞動在個別國家內擺脫了資本的統治。二十世紀特別值得注意的特點還表現在：過去不發達的和落后的東方各國從外國資本的暴力和統治下得到了解放。

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不僅保持着高度發達的國內資本對勞動的統治，而且保持着外國資本對落后的弱小國家的奴役。數十年來，甚至幾個世紀以來，各‘文明’國家一直在剝削和壓迫殖民地人民。現在，殖民地人民正在掙脫帝國主義剝削的鎖鍊，爭取民族自主，朝着獨立發展的道路邁進。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實際上是否認我們這個時代所發生的偉大社會變革的，他們僅僅局限於考查枝節問題，並且不去實事求是地解釋

① “第三屆國際社會學大會報告彙編”，第Ⅰ卷，第6頁。

他們所描述的事實，而是別有用心地提出這些事實以便維護資產階級的制度。

資產階級社會學家否認生產關係的性質對形成整個社會制度的決定作用，他們隨意擺弄事實，而不去分析產生這些社會現象的真正原因。由此可見，他們對社會現象作了錯誤的解釋。次要的東西代替了主要的東西，於是，社會生活便表現為各種現象以純粹偶然的而且常常簡直是妄誕的方式聯繫起來的、雜亂無章的拼湊。

除了歪曲社會變遷的概念外，他們對社會變遷的原因也作了極端折衷主義的解釋。

在這次大會上也反映出大多數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學家並不否認社會的因果性的作用。但是，他們是根據臭名昭彰的折衷主義的“多因素論”來理解因果性、特別是社會變遷的因果性。他們之所以要作這樣的理解，首先是為了掩飾生產關係的性質對社會上發生的一切過程的決定性作用。

正如廖·芳·維茨所表明的，為了代替“對歷史的單因解釋”，他提出了“多線解釋”^①。實際上，這種解釋就是陳腔濫調的折衷主義“多因素論”。

莫·金斯堡教授（倫敦）特別對“多因素論”作了“論證”，他認為他的任務是指出所有社會變遷的“基本因素”。他強調指出，第一，不能想像某一因素比另一個因素更重要，並且建議人們要常把它們作為整體來考查。

莫·金斯堡教授從社會變遷的所有因素中把“天然的個體變化”^②提到首要地位，這種變化可能是純粹偶然的，或者是由生理上的原因或心理上的原因引起的，他認為對此無須特別注意。

社會變遷的第二個因素彷彿是“數目不定的個體的故意的行動”^③。

莫·金斯堡教授認為第三個因素是杰出的歷史人物的影響。

① “第三屆國際社會學大會報告彙編”，第Ⅰ卷，第5頁。

② 同上，第13頁。

③ 同上。

第四个因素是某种“結構变化”(Structural changes)和“結構緊張性”(Structural strains)。例如，莫·金斯堡教授指出，作为十九世紀初英国的階級力量对比变化的“結構变化”，引起了英国的政治結構向民主化方面的轉化。

第五个因素是“各种各样的而又交於一点的成分的結合”^①。例如，莫·金斯堡認為，封建制度是許多不同的路線(这些路線的起源是多种多样的)發展的結果。

“俄国革命”，莫·金斯堡教授这样称呼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看来也是各种形势錯綜結合的結果。莫·金斯堡教授指出了以下的形势：战争的形势和沙皇制度無力进行大規模的战争；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受压迫的农民和比較先进的無产階級的同时並存；由於外国的影响和政府的保护而發展起来的俄国的資本主义工業的存在，因此，当国内还没有独立的產業資產階級时就有了無产階級；其次，俄国知識分子在商業資產階級中間沒有社会根源而且沒有投靠於商業資產階級；此外，莫·金斯堡教授着重指出，应当再加上一个能够夺取政权的小集团，首先是“在俄国偶然有了一个偉大的人物——列宁”^②。

莫·金斯堡教授認為，第六个因素是任何社会变迁的目的論的本質，因为所有社会变迁必然都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才發生的。

莫·金斯堡教授列举了上述决定“社会变迁”的六个“因素”之后強調指出，他認為除了人們“自覺的意向”的重大作用外，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事件的性質，虽然他認為事件的性質並不是社会变迁的特殊因素。

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普·費多謝耶夫提出了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的看法。他說，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就是揭示人类社会發展基本規律的历史唯物主义。馬克思主义揭示出，社会發展和一切社会变迁並不取決於思想动机，而是取決於生产方式、即取

① “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彙編”，第I卷，第13頁。

② 同上，第18頁。

得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方式。但是，在人們生产物質財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所产生的思想，对社会生活也有巨大的影响。社会学家应当估計到思想的这种影响，力求以忠实地反映社会的历史需要这一正确思想来指导社会。为了对这种或那种思想作出正确的評價，社会学家应当善于看出这些思想同与它相应的衰頹的或新兴的生产关系的联系。社会学只有当以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为出發点，並考虑到思想作用和思想斗争的时候，才是站在科学的基础之上的。

普·費多謝耶夫指出，在大会上所作的許多报告中提出了若干有趣的論点，不拘形式地討論一下这些論点显然是有益处的。接着，他对还有許多国家，首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亞洲国家沒有参加这次會議表示遺憾。

苏联学者在大会以后几天的會議上，不只一次地涉及到大会第一次會議所提出的問題。

苏联学者和其他国家的一些馬克思主义者在他們的报告和發言中指出，在社会發展以及所有社会变迁中，社会物質生活生产方式的变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唯·涅姆奇諾夫院士說：“这些变化决定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决定了社会結構的变化，並且也决定了社会成員的精神生活的变化。”接着，唯·涅姆奇諾夫院士指出，某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它所特有的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比資本主义更高級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失業和貧困的消灭就是生产方式影响人的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个例証。

二十世紀的偉大的社会改造乃是人类社会發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合乎規律的結果。同过去的封建社会讓位給資本主义社会一样，这些偉大的社会改造也是合乎規律的。

任何社会形态的基础都是由人們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参与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構成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生产資料所有制的关系。例如，在資本主义社会中，資产階級生产关系的本質取決於生产資料佔有者和只佔有自己劳动力的劳动者之間现实的社會关系。資产階級統治的物質基础是土地、工厂、矿山、鉄路等生产資料的私有制。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階級沒有生产資料，因此他們不得不向生产資料佔有者出賣勞動力。

唯·涅姆奇諾夫院士接着說，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資料的公有制。由於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轉为全民的国家財產，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階級的狀況从根本上起了变化：工人階級和全体人民共同成为生产資料的全民所有者。所有这一切都明显地証明，生产关系的性質对一切社会現象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多因素論”不但沒有說明社会变迁的原因，相反地却远远离开了社会变迁的真正原因。某些資產階級社会学家，例如維·弗利德曼教授（哥倫比亞大学）或乔治·大衛（巴黎）研究所有制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时，狡猾地避开了問題的實質，或者局限於一些空泛的議論，或者轉到对某些枝节問題的研究，这样，他們便歪曲了所有制关系中变化的真实情况。

二、經濟結構的变遷

大会在討論社会經濟結構的变迁這一問題时，所有制問題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

在大会上，美国社会学家維·弗利德曼（W. Friedmann）教授是这个問題的主要發言人，他說，在資本主义国家里，就私有制这个字的原义而言，它已經不存在了。

維·弗利德曼教授在他的报告中企圖証明，資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質的变化是二十世紀基本的社会变迁之一。他也認為，“以往的”私有制毫無疑义地是社会的死敌，因为这种私有制产生了权利、权力和特权。現在彷彿情况根本不同了。維·弗利德曼教授为了論證他这种思想，他以資產階級的观点在民法方面作了离开了本題的論述。他說：“所有权就是法律認可对物、財產、訴訟、法人的最充分的監督形式。它包括兩種監督形式：即使用权和支配权^①。使用权就是佔有（Ownership），而支配权就是所有（Property）。維·弗利德曼教授

① “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彙編”，第II卷，第176頁。

对“最近时期”内“佔有”作为一种监督物的形式开始起着日益显著的作用这一点非常注意。“現在,当我们从社会学和经济学方面考察社会上所有权的职能时,我們不仅指土地或者动产的所有者,而且也指……管理企業和工業康采恩的法人,他們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财产、土地或股票的所有者。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談的所有权,是指各式各样的权力的总和,是指肉体的个人或集体监督全部物質的物(如土地、股票或支配这些物質的物的权力)的程度”[⊙]。

維·弗利德曼除了指出“物質的所有权”之外,还指出了非物質的所有权,例如,签定契約的权力,對於从社会学方面来理解所有权也是非常重要的。报告人同意倫納的意見,倫納曾經断言:雇傭合同愈来愈起作用,抵押权以及对工業财产的监督使私有权失去了以往的职能。如果从前資本家自己能够管理自己的财产,那么現在彷彿已經把这种管理权讓給一些往往比資本家拥有大得多的支配权的人。报告人得出結論說,因此,現在簽訂契約的权力在所有权的形式中已成为一种比任何物的所有更为重要的形式了。

維·弗利德曼教授說:“还在工業社会的初期,所有权的权力成分就比工業社会以前显著地扩大了。当时,企業主佔有了物質财产,或投入生产的資金,不仅能够增加自己对物(工厂、商品或产品)的权力,而且能够增加对人的权力。签定契約、雇傭或解雇的权力,或許是财产本身的一种重要的职能。在工業化的初期,在工会还未成为合法的和强大的組織之前,这种权力使工業财产的所有者(按倫納的分析)能够成为發号施令的人。这些所有者对人和社會的相互关系,实行了冒牌的社会权力,他們掌握了只有社会权力才具有的(按照民主的原則)只有对全体人民負責的社会权力才具有的那种权利。因此,同独裁的政治帝国並存的工業帝国产生了;虽然这些工業帝国存在於按照民法理論有簽訂契約的平等的伪装下,但这种民法很少注意締約双方經濟力量的差別,正好像阿那托里·弗蘭斯有名的說法,法律大公無私地使富人和穷人同样享受洒落在海灘上的权利……”[⊙]

⊙ “第三屆国际社会学大会报告彙編”,第II卷,第175頁。

⊙ 同上,第177頁。

所有这一切彷彿都已成为过去。现在到了現代工業發展的新阶段，由於“佔有和所有愈来愈相互分离”，情况彷彿变得完全不同了。

維·弗利德曼教授在报告中接着說：“美国作家貝尔勒和明斯^①繼續对倫納当时所談到的那个阶段以后的所有制的演变情况作了分析。他們指出，在現代工業社会中，权力愈来愈大的不是企業主，而是管理者。执行委员会代替了企業主。

龐大的同業工会……代替了以前資本家企業主的个人帝国。現代工業的这些同業工会帝国的特征是，只有在很少的場合下，为了实现对大部分物質財富或股票原有的权力，才需要对这些財富进行佔有即法律監督。实际上，股票的所有权愈分散，管理人的監督就愈有可靠的保證，尽管这些管理人可能只掌握很少一部分資產或股票所有权或者甚至对这两者完全沒有掌握。財產的所有权和財產的使用权是互相分离的。”^②維·弗利德曼指出，許許多多的小股東——企業的“所有者”——一般對他們自己的財產是不能实行任何監督的，实际上他們只是一些不勞而獲的、靠剪息票过日子的人。

大股東掌握了股票控制額，在經濟上操有同十九世紀資本家同樣的控制權；然而，維·弗利德曼教授絲毫不提這些大股東還保留着什么样的權利，就得出結論說，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由於股份公司和小額股票持有者的存在，由於後者在實際上把企業的实际管理權轉交給管理人，所以財產所有者的作用降低了。

因此，維·弗利德曼教授企圖斷言，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里，由生產資料私有制所產生的權利正受到愈來愈大的限制。維·弗利德曼教授指出，在這方面，除了財產管理權與所有權相互分離外，還有許多因素在起着作用。在維·弗利德曼教授看來，現在主要通過累進稅和征用的辦法，財富正在進行不斷的再分配。強制保險、免費保健、最低生活費保證金等彷彿在這方面起着作用。國家對使用土地的范围和方式進行了限制，並且規定了使用工業財產的手續。維·弗

① 这里指的是貝尔勒和明斯合著的“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一書，1932年版。

② “第三屆國際社會學大會報告彙編”，第II卷，第177頁。

利德曼教授說，現在各个工業国家都制定了大量的規章和法律，財產所有者必須遵守。

在維·弗利德曼教授看來，所有這一切都證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性質已經起了變化，仿佛這種私有制現在已經失去它的消極的性質了。

不难看出，維·弗利德曼教授所有這一切論斷在本質上都是想要證明，我們這一個世紀所有制性質變化的主要路線仿佛不是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過渡，而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某種進化。蘇聯學者阿·盧緬切夫教授和阿·庫茨涅佐夫教授對維·弗利德曼教授報告的許多中心論點進行了批判。例如阿·盧緬切夫教授指出，社會學並沒有根據得出結論說，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主義的性質根本變化了。維·弗利德曼教授所說的股份公司的出現、所得稅立法、勞動條例等這一切，都沒有消滅資產階級，他們照舊剝削着工人階級。由於技術的發展，技術專家的管理職權日益擴大，但這並沒有改變生產資料佔有者和僱傭工人的社會關係的性質。在技術方面管理資本主義財產的職權雖然掌握在專家手中，但是資本家階級仍然操有經濟權和社會權力。專家、管理人員雖然在生產過程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們是听命於資本家、所有者階級的意志的。專家如果得不到企業主的賞識，常常也會遭到解僱。

阿·庫茨涅佐夫教授在他的報告中和在辯論會上的發言中都談到了二十世紀發生的所有制的變化問題。所有制的變化正好表現在西方社會學家極力避而不談的那一方面。正如阿·庫茨涅佐夫教授所指出的，這些變化是所有制形式本身的變化。

阿·庫茨涅佐夫教授在他的報告中說：“社會進步的歷史表明，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真正重大的經濟變化、政治變化和文化變化，歸根結底都是以所有制形式的變化作為它自己的基礎的。”

阿·庫茨涅佐夫教授接着指出，對所有制的分析不能僅僅局限在這一問題的法律方面，應當擴大到把所有制作為一種經濟關係來進行研究。所有制作為法律範疇而言也反映出的一種經濟關係，這種關係在實質上是客觀的、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所有制是人們主要